

在线健康社区中的隐私悖论： 青年用户的隐私忧虑与互动实践

耿书培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和在线健康社区的兴起,健康信息隐私的概念上升至公共话语前沿。青年用户声称高度在意隐私,但仍积极参与社区互动并主动表露大量健康信息,即表现出“隐私悖论”。基于对多名 18~35 岁在线健康社区青年用户的深度访谈,研究从隐私计算和认知偏差两大理论视角探索隐私悖论现象背后的认知决策过程。研究发现,信息支持、社区互助和情感陪伴代表的利益感知是青年用户健康信息表露的主要动因,其作用胜过隐私侵犯代表的风险感知。尽管收益同风险的权衡过程和博弈机制仍然存在,但信息不对等、过度自信和即时满足等外部限制和内在偏差令青年用户难以客观、均衡地执行隐私计算,并最终带来非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有限理性”决定。研究基于在线健康社区语境拓展了隐私悖论的视域,解释了用户放弃隐私而表露健康信息的动因与机制,印证了理想隐私计算过程被偏转的部分条件,对健康传播和行为经济学的交叉领域有若干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贡献。

关键词:在线健康社区;青年用户;隐私计算;认知偏差;隐私悖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3-0015-1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0 批面上资助项目(2021M701370)

一、引言

(一)共生:在线健康社区与青年用户

国民健康是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基本前提。大数据时代,健康资讯从独立系统走向联结网络,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媒介同健康服务供给者进行互动^[1]。目前,全球范围内近 4.5% 的搜索与健康有关^[2],而中国有 64% 的网络用户访问社会服务网站,其中健康类别的访问频率最高^[3]。在线健康社区(Online Health Community,简称 OHC)逐渐成为公众寻找有效信息进行健康管理的重要平台^[4],它能为患者提供跨时间、跨地域的连接^[5],提升其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6],对健康资本积累有重要促进作用^[7]。

《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 20~39 岁网民合计占比为 37.7%,其中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 2.39 亿,占网民整体的 23.7%。作为互联网“原住民”,青年用户群体是使用在线健康社区的主力军,他们活跃的互动行为、广泛的社交关系和较强的健康意识促进了社区规模的壮大与功能的完善^[8]。与老年用户相比,青年用户更易适应变革,也因此更易面临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与挑战^[9]。目前,在线健康社区的运营很大程度依赖信息表露^[10]:平台根据用户行为改进服务内容,优化商业模式,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也因此需要用户主动提供大量信息。因此,理解青年用户在社区中的互动表现、偏好和背后的心理机制,对在线健康社区的壮大乃至国民健康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博弈：青年用户的需求与顾虑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疾病呈年轻化态势,处在生计发展上行期的青年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关注自身健康状态。多数情况下,线下社区提供的丰富支持和青年用户较高的数字素养足以确保一般健康顾虑得到妥善解决^[11]。即便遇到难题,在线健康社区也能为青年用户提供大量信息、关系和情感支持,成为传统医疗服务的重要后备力量。青年用户不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得到医师的治疗方案,也能在同病友或好友的持续互动中得到陪伴和鼓舞,这最终也有利于各种身心疾病的恢复和健康状态的维持^[12]。

技术发展为公众带来诸多便利,但也带来了安全方面的困扰——用户留下的数字足迹正面临加剧的隐私威胁。相较于注册、点赞和交友产生的身份或关系类数据,同健康信息有关的数据更具私密性。当健康数据遭到泄露或以未经授权的方式用于商业用途,将为用户带来骚扰、价格歧视和污名化等严重后果^[13]。目前,多项调查显示公众存在对健康信息隐私的高度担忧^[14],这可能导致相关数字服务的拒绝率升高、信任评价下降^[15],进而引发数据质量下降和客户流失等问题^[16-17]。用户在“退出以保护隐私”和“表露以得到支持”之间来回摇摆,动摇了在线健康社区的基础服务模式,令其发展面临阻碍。

（三）困境：信息隐私悖论

显性收益同潜在损失之间的博弈也被称为隐私计算过程^[18]。如果收益大于风险,用户便有足够的理由和动力进行健康信息表露。但某些情形下,用户声称极度担忧隐私,但仍毫不犹豫地公开私密健康资料,这种隐私信念同实际行为选择不一致的矛盾状态被称为“隐私悖论”(Privacy Paradox)。隐私计算模型将此悖论单纯地解释为“收益战胜风险”,但有限理性观点则认为效用最大化假定并不成立。因为用户没有充分的信息资源、环境条件和认知能力执行理性的“收益—风险”权衡,而经常受制于时间压力、信息不对等、情绪波动、认知疲劳做出有偏的决定。结合在线健康社区的“健康”语境,表露信息带来的支持性收益是即时的,而隐私风险短期内难以兑现,因此用户决策的有限理性特征可能更明显:偏向短期收益,忽视长远风险。

隐私悖论这一现象对商业平台、法律和技术主体皆有重要影响。用户以违背自身隐私关注的方式表露信息令商业主体保护隐私的责任和义务范围大幅缩减,助长了由信息数据逻辑驱动的商业模式。监管主体基于隐私关注内容的法律规制工作效力降低,而技术主体的工作重心发生根本转变,隐私保护工具的开发方向由事后补救转向事前干预和实时监控。尽管多学科研究都试图揭示隐私悖论现象的本质,但隐藏在简单二元关系背后的信息表露决策过程极为复杂。以往关于隐私悖论的经验研究中,问卷调查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它们虽然充分揭示了隐私计算框架和其他因素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但仍有两点不足:一是研究容量有限,难以避免遗漏变量干扰;二是测量结构易遭遇误差,很难准确描述用户表露信息的心理机制。

已有研究证明,隐私悖论存在代际差异^[19],年长用户决策过程相对更加理性,年轻用户决策更易受到干扰线索的偏转,由此,本研究聚焦了18~35岁的青年用户群体,通过深度访谈探讨在线健康社区中青年用户的健康隐私忧虑与社会支持感知水平对其健康行为的干预,进而对隐私悖论现象提供更多有意义的见解。隐私计算理论代表的规范观点认为,个体是在收益同损失均衡博弈的理性状态下制定效用最大化方案,以指导特定决策。但现实环境下,个体能得到的信息资源、调用的认知精力和实时的思考状态有限,通常是在不完全信息、不对等信息和欠佳的状态下做出利益相关决定。故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观点,试图对规范经济模型的局限加以修正,认为人们会适当简化选项的复杂性、降低决策难度,但仍以利益最大化为总体目标^[20]。本研究重新审视了经典隐私计算理论,指出其在解释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信息隐私决策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并强调了使用行为经济观点作为补充解释的必要性。

二、文献回顾

(一) 在线健康社区中的收益与风险评估

人的行动具有趋利性,因此人们参与在线健康社区所得回报是其持续使用并深度交互的主要动机。有学者从外在和内在动机两个角度解释了个体对相关技术的接受程度,并进一步在动机框架内重新定义了技术接受模型^[21],与之相近的观点还包括自我决定理论和人类需求层次理论^[22]。出于外在动机,人们接受协议、购买服务、扩展关系是为了进入更高平台、实现更大价值或是追求额外利益,这构成了在线健康社区的效用价值。出于内在动机,人们加入互动并表露信息是为了纯粹的爱相投、情感共鸣与互帮互助,所得收益局限于平台内部。在线健康社区有别于社交网络、电商服务等平台的特性便在于此:首要使用动机并非金钱和娱乐收益,而是社会支持^[23],且社会支持需通过满足成员的信息、情感甚至给予他们更强的社区意识来实现^[24]。社会支持能够以三种方式影响个体健康:①调节思想、感情和行为以促进健康^[25];②培养个人生活的意义感^[26];③促进健康的行为(如饮食、锻炼、充足睡眠、适当使用药物等)^[27]。目前,信息支持、有形支持、情感支持、尊重支持和陪伴支持等维度在互联网健康背景下得到了验证^[28]。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净利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投入。用户的收益感知并非其实际所得,而需与成本和风险进行比较,以决定最终选择。在线健康社区中信息表露的主要风险为信息隐私泄露风险,这是个体认为表露个人信息遭到损失的程度^[29]。用户对风险的评估包括两点,评估消极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及消极后果的严重程度^[30]。信息系统研究中学者主要用信息隐私关注和风险感知作为风险评估的维度。风险感知和隐私关注的程度越高,参与在线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小^[31-32],信息表露的意愿就越低。Weinstein回顾了描述健康行为的主要理论——健康信念模型、保护动机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和绩效理论,并发现保护的动机来自感知到的威胁和避免潜在负面结果的愿望。其中,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为探索威胁和应对评估的竞争影响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视角^[33]。威胁评估涉及个人对其信息所面临威胁的严重性和可能性感知,应对评估涉及个人对减少威胁能力的感知。这些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核心便是“收益—损失”权衡的基本框架,即假定用户的行为动机和行为倾向基于对所得和所失的比较,分析结果决定了最终选择。

由此,隐私风险与信息表露利益之间的权衡构成了隐私计算(Privacy Calculus)过程^[34],并被广泛用于预测各种信息行为。Culnan和Bies将这一过程理论化为效用函数,即净收益同净风险的配对比较结果^[35]:如果用户认为效用为正,那么将继续或加剧原有的信息分享行为。

(二) 隐私悖论及其两种解读

根据隐私计算的基本观点,隐私关注与信息表露本应具备负向联系:越是声称担忧隐私,越不会加入在线健康社区并表露敏感个人信息。但许多研究发现,用户并不总是做出与声称态度一致的举动,被破坏的隐私态度与隐私行为之间的关系被称为隐私悖论^[36]。通过对这一悖论的利用,对数据有迫切需求的商业平台成功诱导用户自主、自愿、自觉地表露健康信息构成当下主流“知情—同意”模式的灰色地带。若不对隐私悖论及其深层动因加以理解,用户与在线健康社区的互动将面临长久威胁。

1. 精确权衡:理性的“利益最大化”

在“收益—损失”权衡的经济分析框架下,隐私悖论的直接解释是收益胜过损失,隐私关注被强大的利益诱惑所击溃。持此路径的研究者承认隐私关注与信息表露的负向关联持续存在,但强调在线健康社区带来的信息、资产、陪伴和社会关系机遇值得用户将个人信息安全作为赌注。考虑到年轻人是数字服务的主要使用者,及年轻人的行为更具风险倾向性的事实,青年用户更易察觉平台提供的收益,因此有更多机会克服自身隐私关注表露信息。此时的隐私悖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悖论,而是收益评估胜过损失评估的终局表现。

考虑到隐私计算模型及其前身,大量信息系统领域研究者以此路径理解隐私悖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定,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将决策者描述为“精明的利己者”——罗列所有可选项,估计所得收益和损失的总和,根据计算结果决定是否/如何行动^[37]。绩效理论、公正理论、资源交换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等经典模型皆是基于该假定的产物,隐私计算模型亦由此而来。该理论将信息表露决策过程描述为完全信息充分的、自主决定的、缓慢且蓄意的认知思考过程。由于客观世界的收益和损失要素非常丰富,此类研究扩大了收益和损失的各种表现形式,例如从隐私关注的来源考虑将风险划分为垂直(机构、企业)与水平(其他用户)两个维度,或是从收益的时效性出发将收益列为短期收益与长远收益。不论关照哪类语境、使用何种理论资源和实证方法,此类研究始终沿着“收益与损失比较”这一主线寻找相关因素,并将隐私关注同各类收益的影响系数进行比较,形成如下共识:隐私悖论并非客观存在,仅仅是用户对信息隐私赋予的价值不低于对使用在线服务所得馈赠赋予的价值而已^[38]。

2. 隐私决策过程中的偏差

在收益和风险之外,行为科学研究还发现了其他可改变用户隐私决策的因素,包括框架、默认设置、选择过少、锚定等心理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心理效应很容易被环境线索激活。外在环境可能限制人们执行理性权衡和慎重思考的能力,如在时间压力、选择匮乏、冲动情绪下,人们的行为选择经常依赖心理捷径,例如经验、直觉和浅表的判断,这样更容易放大行为的收益并低估其风险^[39]。

与基于成本效益和社会因素的规范视角相比,行为学研究广泛强调启发式与认知偏差对个人决策的影响^[40],并指出因在线隐私决策的不完整信息或评估收益风险资源的有限精力,用户并不总执行理性计算。换言之,用户的认知决策处在有限理性状态,他们很难得到决策所需一切信息,亦不可能调动全部认知资源正确处理每个细节,所做理性决定限于认知能力范围内的“理性”^[41]。

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建立关系、获取信息、加入社群,但很少意识到自己接触到的界面和功能正有意无意地引导行为决定做出改变。当用户处在弱意识状态下,信息表露决策完全是对认知偏差和认知启发式的自发反应,这些案例包括:用户会对隐私条款的长度而非内容做出响应^[42],会因权限请求表达方式的变化做出不同决定,以及会在亲朋好友的压力下执行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43]。在用户看来,表露信息带来的好处是具体而即时的,但与之相伴的隐私风险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他们总在意“能得到的”,而非“可能会失去的”。因此在有限理性的隐私决策中,信息隐私悖论源于用户认知决策过程遭到偏转,即原本执行“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损失”的理性认知模式被其他因素破坏。

以上基于行为视角的有限理性观点以及先前的隐私计算观点均为隐私悖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解释。然而隐私决策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现象^[44],个体在不同环境中将可能表现出不尽相同的信息行为,因此本研究聚焦在线健康社区这一情境水平,通过质性方法得到关于隐私悖论及其认知决策过程的诸多开放信息。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线上田野的参与式观察,遵循“确定研究问题”“识别与选择线上社区”“沉浸式观察与资料收集(伦理确认)”“资料分析与解释”以及“撰写报告”等步骤^[45],笔者自2021年起深入多个在线健康社区,通过实时观察了解社区成员的互动行为模式。首先,笔者定期记录田野笔记并更新相关资料,全面客观地了解在线健康社区市场的基本状况,建立并发展同社区成员的持久关系。随后,笔者锁定若干个不同主体类型的在线健康社区执行下沉式体验,包括参与讨论板互动、共享个人健康信息、执行平台用户调查、加入专业社群以及收集并分类健康信息等活动。基于网络民族志的经验资料,笔者使用探索性访谈大纲和半开放式问题捕获更加全面的语料数据。

根据标准流程,本研究从设计效度、分析效度和推理效度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设计^[46]。

设计效度是指定性研究的执行情况及过程的科学性。出于自愿参与原则,本研究得到了近 30 位青年用户的响应。根据时间安排与样本多元性原则,14 位有丰富使用经验的在线健康社区用户完成了深度访谈,他们的年龄分布于 18~35 岁,职业分布于教育、法律、环境、军事、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文化水平从高中到博士不等。

分析效度指定性数据分析过程的可靠性与结果的可信度。根据研究问题,笔者设计了访谈提纲,主要包括:在线健康社区的使用与互动经历(包括线上问诊和就医经历);通过在线健康社区的功能寻求的具体帮助和支持;健康信息隐私态度及隐私被侵犯的问题应对举措;影响信息表露决定或者健康信息隐私态度的经历和原因,等等。面对访谈语料,本研究严格执行主题分析法步骤,以句号为单位,对语料进行编码。在完成第 12 位受访者语料分析后,已没有出现新的主题和维度。为防止遗漏内容,本研究额外补充 2 位受访者,也未发现新的范畴。由此,可以认为本次访谈的数据已达到理论饱和。

推理效度是研究者解释语料的质量及研究结果的可推演性。为实现推理的可确认性,笔者采用了随机检查的方法,比如要求受访者在访谈结束后再次详细阐述之前自己表达的观点,以寻求一致性。访谈过程中笔者与受访者均可以提出问题或抛出新话题,访谈结束后,笔者反复播放录音,判断受访者的语气、重音与情感偏向,并对录音内容进行文本转录。

访谈开始,笔者以书面形式告知受访者研究目的(仅用于科研)和研究伦理,完成答疑工作。在确保每位受访者完全知情且同意录音的情况下,访谈正式开始。

每场访谈都遵循半结构化访谈的基本流程和操作方法,最短访谈时间为 22 分钟,最长为 47 分钟。访谈过程中,笔者和受访者均可提出问题或抛出新话题,但访谈的整体节奏和走向由笔者把握。表 1 列出了匿名后的受访者基本情况,P1 至 P14 代表受访者接受访谈的时间先后顺序。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一览表

| 受访者 | 性别 | 年龄 | 教育程度 | 职业 | 健康状况 |
|-----|----|----|------|-------------|-------------|
| P1 | 男 | 29 | 硕士 | 在校学生 | 良好 |
| P2 | 女 | 28 | 博士 | 事业单位人员 | 子宫囊肿已手术;甲减 |
| P3 | 女 | 29 | 本科 | 新闻记者 | 良好 |
| P4 | 女 | 27 | 硕士 | 科技公司员工 | 妇科疾病(炎症) |
| P5 | 女 | 25 | 高中 | 自由职业 | 慢性疾病(胃炎、贫血) |
| P6 | 女 | 18 | 本科 | 在校学生 | 良好 |
| P7 | 男 | 27 | 博士 | 在校学生 | 慢性疾病(高尿酸血症) |
| P8 | 女 | 29 | 硕士 | 律师 | 慢性疾病(高血脂) |
| P9 | 男 | 19 | 大专 | 在校学生 | 良好 |
| P10 | 男 | 32 | 博士 | 在校学生 | 良好 |
| P11 | 女 | 28 | 硕士 | 国企员工(海外分公司) | 乳腺良性肿瘤手术 |
| P12 | 女 | 35 | 硕士 | 教师 | 良好 |
| P13 | 女 | 25 | 硕士 | 地产工程师 | 乳腺结节 3 级、痔疮 |
| P14 | 女 | 34 | 本科 | 央企员工 | 良好 |

注:受访者的身体状况均为自我报告的结果,访谈过程中不排除受访者不自知或隐瞒相关信息的情况

鉴于在线健康社区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本研究并未针对特定疾病类型或特定规模社区展开研究。“隐私”是一个高解释水平的概念,用户的印象往往是抽象、高级、模糊的,与其长远的态度、行动意向密切相关。将健康信息隐私纳入某个特定场景,将原本抽象的概念强行具体化显然容易带来偏差。因此,赋予受访者充分的认知空间,观察用户对在线健康社区信息隐私的总体印象和一般性感知,能够允许我们最大限度地接触用户的真实想法和态度。

四、主要发现

青年用户面对健康信息隐私表现出复杂的矛盾性,他们一边出于隐私担忧启动保护措施,一边又因平台提供的收益而选择自我表露。本研究基于隐私悖论现象的具体维度,从规范视角下的理性权衡与行为视角下的偏差因素两方面出发,深入思考在健康社区中青年用户的隐私忧虑与互动行为。

(一) 知与行的脱节:隐私悖论的多元表征

在回答“自己或周围熟人是否因为在线上健康社区发布内容而遭受相关负面后果”的问题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报告了自己或认识的人所在健康社区的负面经历。然而即便如此,访谈语料仍然提示,受访者并未因此减少线上互动参与频率或放弃表露健康信息。

1. 发现与遮蔽:社交隐私与机构隐私的迥异境遇

语料提示,受访者对风险相当敏感,他们认为更多的威胁来自朋友、家人代表的水平方向风险,而非企业、组织等代表的垂直方向风险。故前者被称为社交隐私风险(同为用户的他人“拿走”信息),后者则被称为机构隐私风险(信息被用于企业执行数据分析)。

“我是一个 gay(同性恋),我知道自己是个边缘人,所以不想让那些所谓的‘主流人’知道我这个隐私,因为很多人喜欢站在‘上帝’视角来评判,我不喜欢被别人 judge(评价)。我在健康社区查一些性病资料,我一定是匿名的,不然我会很不安。”(P1)

“当我想到健康隐私的时候,我想到的更多是我好像整个人袒露(暴露)在了一些认识的人面前,他们可能会发现我一些比较尴尬的秘密……”(P6)

“我觉得在不透漏真实姓名的情况下,身高、体重啥的可以说。但是关于我乳腺结节、痔疮和脱发这些问题,我可能都不愿意分享(还是有些担心被人嘲笑……)。”(P13)

受访者始终强调在他人面前的形象管理,担心疾病暴露招致的尴尬,很少提及基于个人信息的广告推动和其他定制服务。如果在线健康社区为用户营造一个匿名化的交流环境,很好地为个人信息隐私提供保护,那么用户愿意承担部分隐私泄露风险加入社区互动(P14/P2)。除了担心平台利用自己的信息进行非授权交易外,青年用户更担心他人,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看到自己的一些隐晦疾病,比如手术记录、性传播疾病,等等。整体看来,社交隐私威胁取代平台层面的垂直威胁,构成青年用户的主要顾虑。

2. 越过风险:不同信息的“区别对待”

访谈语料很好地呼应了语境一体化观点^[47]:身份、疾患、地址等不同信息类型具有不同敏感性,这源于表露后人们面临有差别的风险环境。对于不同信息,用户会根据场合、对象采取针对性策略,久而久之形成表露特定信息的准则和规范。与性别、年龄甚至体重等常规人口特征相比,用户对健康疾病往往三缄其口,甚至连模糊的门类也不愿透露。

“运动型的健康信息可以分享,疾病类信息需要高度保密。”(P1)

“平时一般的都还好,但有些敏感的……比如你老板知道你有抑郁症就会歧视你或者不敢用你。要是我分享的一些健康信息回过头还对我造成了伤害,我是一定不会发布的,这是我的底线。”(P9)

“我只要不分享太敏感健康信息,我都不会太在意,就算有这些信息也不能拿我怎么办呀……”(P2)

“我在使用这个在线健康社区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姐妹”会问到比较隐私或者害羞的问题,比如顺产产道松弛了怎么办,夫妻生活有问题怎么办,但是这些都是匿名的,很少有用户实名分享,毕竟这些事情有时候还是羞于启齿的。”(P3)

换言之,只要不触犯敏感健康信息的底线,用户通常愿意分享那些相对无关紧要的内容——运动信息不仅不会被人嘲笑,反而有助于塑造健康积极的社交形象。困难在于,何谓敏感信息是一个相当主观的问题。经济条件、社会背景、成长环境本就会带来认知判断差异,年轻用户相比年长用户对相同信息的风险估计更是持有不同标准:前者更注重交往,后者更注重安全。因此,青年用户在使用在线健康社区时存在隐私关注高但风险感知低的“悖论”:承认对信息所有权和控制权被侵害的担忧,但表露决定只听从风险感知的安排。这可能令信息隐私安全和个人身份形象陷入长期的威胁积累过程。

3. 熟识与信任:隐私忧虑的“让位”

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与能理解他们感受并提供关心的患者进行交流。当用户体会到心理上的力量和鼓励,他们把自己视为社区的一员,减少了孤独感,产生了认同与亲近感。所以,即便受访者声称自己对健康隐私高度关注,他们仍有很高水平的健康信息表露意愿。

“我从(乳腺)手术开始前就加入了这个社群,和里面的人经常聊天。时间长了,大家都有感情了,有几个还私底下加了微信。所以我会和病友们分享我的经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在帮我的朋友,我心里很有使命感。”(P11)

情感支持可以提供温暖和安慰,这减少了用户的压力和其他负面情绪,也发展了亲密关系和信任关系^[48]。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会影响用户的判断和行为,并在其进行决策时被激活^[49]。拥有内化情感联系与隐性规则的用户社群区别于靠理性权衡和契约法律机制运作的社会,在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网络中(如持续互动且存在情感黏性的在线健康社区),用户对自身所处环境和关系网络的信任感将影响其健康信息隐私关注水平。

“我要是长期用这个平台,也没碰到什么不好的内容,或者说讨论板、留言区环境比较清爽(平台对内容把控过关),我就会愿意在这里分享健康信息。”(P7)

先前研究表明,用户对平台的积极经历会引发其信任度的提升^[50],换言之,个体参与在线健康社区所获得的高质体验越多,其对健康隐私泄露的担忧就会相应降低^[51],信任 and 安全感将促进用户健康信息的自我表露。作为一种风险降低机制,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与减少隐私关注相比,增加信任能更显著直接地作用于信息分享行为^[52]。对此,访谈语料进一步提示,青年用户实际表露信息比其意图上愿意表露的信息要多很多。

4. 重塑边界:“假想”的可见范围与安全角落

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在健康社区中的信息内容是缺少控制力的。尽管对信息隐私泄露的细节问题缺乏认知(如具体过程、机制等),但他们仍能模糊感受隐私泄露的严重性远超自身预估。对此青年用户尝试通过调整信息可见性与在线社交距离而非通过调节自身信息表露水平来管理健康隐私担忧。受访者表示,尽管面临影响力受限的可能,他们对健康信息内容的发布也更具针对性,倾向于针对特定人群交流特定话题。在控制能力有限的前提下,用户不断完善信息控制策略,更改设置管理隐私边界,如拒绝好友申请或更改个人资料的访问权限。由此,在更改隐私设置之后,那些声称担忧健康隐私的青年用户开始放心地在自己设置的安全范围内表露个人信息。

“我一般都不会在公共讨论板上说话(发布信息),很多时候只是回答其他用户给我的私信留言,所以至于隐私应该还好吧……”(P11)

“我的个人主页非好友是看不到的,发布健康话题我也会关闭定位。所以我很放心,Po(上传)一些照片啥的也无所谓,当生活记录了。”(P2)

当个人对健康信息发布和可访问性有更多控制权时,他们往往会透露更多个人信息,使自己面临更高的隐私风险^[53]。语料进一步回应了青年用户对社交隐私与机构隐私的区别评估。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用户只要留下痕迹,不论如何设置权限,总有机会被其他用户或机构所得知。由此,用户对自身信息的管理权限与实际信息的发布范围呈现分歧与差异。

(二)精明的决策者:规范视角下的理性选择

根据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54],用户的决策应是合理且合乎逻辑的,为获得最大的利益或满足,在决策过程中个人将寻求最大化效用和最小化风险原则。规范视角下,理性选择观点在预测隐私态度和隐私行为方面仍然有效,至少为用户设立了理想状态下一个自主思考的行为标杆。

1. 自利原则:承认风险与目的性忽略

访谈语料提示,青年用户认为自己能够科学分析健康信息表露所面临的收益和风险,也有意识地解决了风险收益之间的矛盾。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的积极表露通常与实用收益需求和社交享乐收益需求相关,这些收益也对应了健康社区为他们提供的信息、情感、陪伴、尊重等社会支持。在进行“风险—收益”权衡过程中,多数受访者均表达了对健康信息隐私的担忧,也承认隐私担忧会影响其健康信息表露决定。但多数人认为,对于那些没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健康隐私泄露,他们可以一定程度接受。如果在线健康社区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用户愿意交换自己部分健康信息隐私以获取更多收益,感知收益越多越强,他们越是能感到承担隐私风险的行为得到了补偿。

“当其他用户(尤其是医生)为我提供含有‘确定’性质的信息时,不论(信息)是好还是坏(积极还是消极),我都会感受到心理支持,不管在情绪上有没有帮助,至少让我避免了‘不确定感’所产生的疑惑和焦虑。”(P7)

“我很喜欢 keep(健身社区)这个互相鼓励的功能,比如说你正在练习的时候,屏幕会弹出来告诉你谁在练,还能传送‘加油’的表情。我经常会得到陌生人的鼓励,我也会经常鼓励别人。”(P1)

“多多少少肯定是觉得隐私被侵犯了,但又能咋样呢,我都来寻求帮助了,这种迫切的时候还是自己比较重要吧,总体上还是划得来的。”(P10)

对于维系社交关系、构建良好身份、验证社会地位、弥补情感缺失等需求,青年用户认为需求满足要比面临健康信息隐私泄露风险更加重要。此外,在线健康社区已被仪式化或融入日常生活中,用户的深度使用及卷入度提升相应弱化了“风险—收益”比较的权重。在线健康社区用户通常认为表露信息的收益远胜于潜在风险,这最终导致对隐私问题的忽视。还有受访者表示,在某些线上社群或讨论板可以看到很多患者分享的用药类型、使用剂量和效果以及主观感受的副作用等,这些是在平时线下问诊就医很难获得的信息。换言之,除了医生提供的“具有专业性的单向信息外”,病友之间沟通带来的“双向信息互动过程”也是青年用户信息表露决策的重要衡量标准。

2. 秘密交换:隐私让渡的权宜之计

除了自身基于纵向维度的净“收益—风险”权衡,青年用户还会横向比较与他们处在同一社区中其他用户的信息决策行为。在理性且经济的前提下,青年用户不断衡量信息代价和利益,并选择最优方案来行动。部分受访者表示,尽管担忧隐私,但如果其他用户表现出比较积极的信息共享与互动意愿,他们也会更大程度“对标”同伴行为。

“我和其他人都分享了各自的健康信息,我泄露了我的隐私,但是我也得到了别人的隐私,这样一比较也不算亏吧……”(P4)

“我在获得有利信息之前,我是不会率先暴露自己的(分享个人健康信息)。我也得看到别

人的诚意,这都是相互的。”(P13)

在更加看重社交隐私的青年用户眼里,信息表露是在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你告诉我,我也告诉你”。与纯粹的一次性经济交换不同,健康社区用户间的信息共享可被视为一种广义的社会交换形式。基于依赖与互惠原则,社区中多位用户相互之间贡献健康信息,他们存在相对长期的利益关系且各自没有明确的义务和责任,对后续回报也没有固定期望。社会交换过程中,拥有积极的结果可被用户视为利益,而消极的信息共享可被视为交换成本。用户的公平认知是基于利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他们试图最大化利益,最小化成本,尽可能不让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对于青年用户来说,让渡部分健康隐私的权宜之计既可以提升自我在社区中的价值感与形象地位,更能获得高质量的体验。

3. 隐私倦怠:不断更新的隐私设置

有学者将当下的互联网环境比作一个全景监狱^[55],而在常态化的隐私透明环境下,持有隐私顾虑的青年用户对于隐私泄露问题习以为常以致出现了隐私倦怠心理。青年用户希望可以控制个人健康数据,但平台提供的烦琐、冗长的隐私政策通常会让他们跳过这一复杂过程。此外,出于商业或线上环境维护等目的,平台会不定期更新条款,种种原因让用户难以对隐私政策产生信任。几乎没人会花时间和精力去阅读隐私政策与声明,在多数人看来这些任务是繁重且没有价值的^[56]。

“每次注册 APP 我都要同意隐私政策,但很多情况下我没有仔细看,如果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功能,我也只能同意。”(P13)

“说实话我从来没看过,我每次都会点同意,条款太长了,根本读不完,读完也只能点同意。有的还很细(对于具体的信息公开对象和程度都有划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用处不大。”(P1)

由于复杂的隐私协议要求用户投入更多认知成本来理解内容以及青年用户对自身健康信息管理的失控,隐私倦怠作为一种消极应对机制,让那些声称担忧健康隐私的用户产生徒劳感和心理压力,并放弃采取实质性行动来保护隐私。理性忽略理论认为,用户会有选择地忽略某些信息或步骤^[57]。对多数青年来说,阅读隐私政策与否,不会对自己的健康隐私造成任何影响。相比跳过隐私条款,直接使用在线健康社区带来的收益远胜于在隐私政策上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成本。

(三) 信息隐私黑箱:认知偏差与启发式决策

尽管个体在信息决策过程中遵循“收益—风险”理性权衡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然而隐私计算也具有情境性和个人决策的偏见性^[58]。在某些情况下,青年用户关于“收益—风险”的评估受到了时间距离、偏好程度、情境等因素的影响,这最终会导致计算过程中的潜意识偏差。

1. 收益偏差:即时满足与风险扩散

在线健康社区中,青年用户对于收益和损失的评估是不同的,因为决策通常是基于感知到的收益而非损失,他们对风险的判断比对收益的判断更加严苛。多数青年用户在健康信息表露决定时更倾向于关注收益的可能与比例,而相对低估了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隐私风险很容易被忽略,而利益很容易被优先考虑。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总是先强调“我能得到什么”,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实际利益,而非先前声明的“担忧未来风险”。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在表露信息过程中(类似于分享病例、药物处方、诊断报告)收到了垃圾短信或广告电话,他们就会停止使用平台并拒绝分享健康信息(P1/P7),但最初的健康信息表露决定确实受到了当下即时收益的吸引。

“(平台)要求我上传 B 超单和身份证,上面有我的姓名年龄还有乳腺结节大小等信息。但是我急需线上问诊,想听听医生的建议,所以只能先上传,之后再考虑信息泄露(的情况)。”(P11)

还有研究指出,当信息产生激励情绪或即时满足感时,用户往往会低估长期风险和损失^[59]。情感启发是一种心理捷径,可以让人们根据自己情感印象迅速做出判断和决定。由此,用户专注于从

健康信息表露中立刻体验到的好处,从而减少对隐私风险的长久考量,认为收益是切实可得且有高度保障的,而健康信息被泄露的风险发生只是一个概率性事件。

“如果我这么做(表露健康信息)平台愿意赠送我会员,或者在平台内买东西可以给我打折,我就会立马这么做(表露健康信息)。”(P7)

时间贴现理论认为,个体偏好往往随着选择时间的临近而改变。收益和损失在时间距离上的差异让青年用户的隐私决策过程丧失了均衡性。当用户认为信息表露收益即时可得,而风险会随时间得到分摊时,易产生风险较低而收益较高的错误认知,进而倾向于依据收益强度来做决定,忽视了个人面对风险真实的脆弱性^[60]。很多时候,缺乏经验的青年用户并未意识到这种偏差,从而导致长远安全利益受损。

2. 乐观偏差:过度自信与风险低估

关于风险决策的许多研究认为,人们倾向于低估自身遭遇隐私被侵犯的风险,并高估他人遭遇相同事件的机会^[40],访谈语料也回应了这一点。乐观偏差理论指出,个体不愿意对低概率发生的隐私风险事件采取相关措施和保护行为,他们认为威胁较低或参与成本较高^[61]。

“别人我说不准,但我本身学历还可以,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甄别能力的,就算我在网上表露健康信息了我也不会轻易泄露自己的健康隐私,所以这不会影响我的决定。”(P10)

“这么大人了,隐私泄漏这种事情自己还是有点底的吧,肯定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但其他人不好说,网络又没有门槛,尤其很多老人小孩都在网上。”(P12)

对健康隐私侵犯的乐观态度与个人对自身技能的过度自信认知,让青年用户并未采取积极行动来保护健康隐私。语料提示,受访者对于隐私管理的自信程度可能超过了其健康隐私关注程度,尤其是先前对隐私担忧较低的人,这也与之前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62]。也就是说,青年用户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了解社区使用的收益和隐私问题,因此他们在表露信息时出现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会更小。

3. 信息偏差:隐私素养与知识的匮乏

使用在线健康社区等场景时,不了解隐私问题的青年用户可能不关心信息表露的风险和收益。信息获取的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等阻碍了用户进行“风险—收益”权衡,他们对自身健康数据价值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判断,更无法计算健康信息表露之后的结果。“隐私知识和意识的匮乏”是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无法进行理性权衡或将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原因之一。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收到一些推销短信,说点开APP下单,立减多少元。这应该是说明我的健康信息隐私被泄露了吧?我也不太确定诶。”(P5)

“像我这种还是有知识的人,我都不知道泄露了我的健康信息有哪些危害,但是我知道不太好,我说实话,我不晓得我的信息用到哪里去了。”(P8)

知识匮乏假说再次提示,个体不适当的隐私保护或鲁莽的信息表露源于知识的缺乏,这是不同人群间日益扩大的知识差距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63]。部分用户缺乏计算隐私风险和表露收益的认知能力,也无法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以做出知情判断。在有限的时间内,用户只能在不完全了解风险和收益的情况下做出隐私决策。由此,他们无法全面考虑到健康隐私被侵犯的风险和表露健康信息所具有的潜在好处。此外,对潜在隐私威胁进行评估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而大多数人很难合理地判断未来隐私侵犯的可能性。因此部分青年用户的隐私决策由于知识、意识和能力的限制受到了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理性的约束。

五、讨论

数字经济时代,“隐私交换免费”已成最基本的商业模式,构成用户同平台关系的基础。与其他

信息类型相比,健康相关信息的敏感性更高,因此健康场域下的隐私悖论将为用户身心安全带来额外威胁。本研究立足在线健康社区,关注隐私悖论的内涵表征、决策动机和被偏转的决策过程,通过质性研究材料的收集分析,指出了健康信息经济理性决策的总体目标和现实困境,反思隐私计算理论在解释“隐私悖论”现象时的贡献与局限,拓展了隐私悖论的研究语境,丰富了该现象的理论视角。

(一) 主要发现

在线健康社区青年用户一方面出于隐私忧虑启动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又因平台带来的收益与社会支持而进行积极自我表露。他们的信息隐私悖论主要体现在对社交与机构隐私、健康信息类型、平台信任程度与管理权限和可见范围出现了认知差异。隐私悖论的多维表现提示研究者应注重青年用户在健康社区中隐私管理的差异性和动态性。

由于数字环境下的收益和风险长期存在,让用户保持经济理性的得失权衡、做出自给自足的“知情—同意”决定始终是监管、市场和技术主体共同奋斗的目标。青年用户较高的数字素养与持续卷入程度完善了他们对平台功能和信息隐私实践的认知,这些经验构成了理性权衡的基础,帮助他们更加科学地判断收益类型和诱惑强度,以及识别造成风险的主体、风险本身的强度和发生概率。而无论处于何种条件,收益永远是用户最直接关心的重要话题。在线健康社区中,青年用户通常自愿且主动放弃部分健康信息隐私控制权以换取更多社会支持收益。由此看来,隐私计算理论仍是预测个体信息行为的重要工具,保持并尊重用户对收益和损失的主动判断是理论研究和应用开发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尽管用户声称坚持最大化收益、最小化风险隐私策略,但由于知识匮乏、信息不对等以及过度自信、即时满足等认知缺陷的存在,青年用户最终受限于非完全信息环境下做出有限理性决定。有时他们甚至对在线健康社区平台制造的陷阱毫无防备,对自身“态度—行为”不一致的状态毫无意识,隐私计算遭到诸多外在环境因素干扰。解释水平理论认为,风险比收益更加抽象,更能影响人们的远期态度而非当下的实时选择。情境线索减轻了未来的潜在风险,并强调了即时利益,青年用户更倾向于以牺牲未来可能的风险为代价,在短期内获得即时回报。他们对隐私问题和相关风险的评估往往是抽象的,是基于未来某个时间段的,而对于健康信息表露所获得的收益感知是具体可观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具体的收益往往压倒了抽象的风险,令青年用户的信息表露决定容易受利益和好处驱使。尽管如此,不论是否遭遇偏转,青年用户对于收益的重视是在风险对比框架之下的,“收益—风险”权衡依然存在于信息表露决策阶段。

(二) 研究贡献

首先,本研究将隐私悖论的研究语境拓展至在线健康社区,一定程度弥补了健康信息之于交易、社交和位置信息相对被忽视的地位。健康信息泄露除了会造成隐私和安全危机,还会造成形象受损等社会方面的后果,故健康场域的隐私悖论研究有待持续壮大。

其次,本研究通过丰富隐私计算理论,解读青年用户面对健康信息时的隐私决策过程,具体揭示隐私计算被偏转的某些条件,为隐私悖论现象的解释提供更多维度和层面。认知过程双路径观点一直认为,研究者不必在人类决策理性本质和非理性本质问题上一争高下。作为心理活动的基本面,逻辑推理和经验直觉本就属于大脑活动的某些表现,这取决于自身状态,也取决于外在环境^[64]。换言之,理性和非理性从来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共存共生,各自在特定情形发挥作用。

再者,研究结论为用户、平台与监管机构的隐私保护政策提供了若干思考。服务运作机制的调整和数据二次交易情况的告知,在线健康信息行业政策和规章条例的完善,以及个人信息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平衡,一定程度会改变青年用户信息共享的边界。本研究呼吁相关法律法规的关注重点可由“知情”环节转向“同意”过程。

最后,本研究启示了青年用户群体的隐私行为选择和自我健康管理。在人口负增长、老龄化情

势下,青年群体的健康状况是社会活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健康中国等战略实施的重要焦点和目标。当前,诸多疾病呈现年轻化态势,由于工作压力、生活环境、社会关系等因素,亚健康成为多数青年人的普遍状态。本研究结论为青年用户的积极健康实践与健康隐私保护提供了方向与反思。

(三) 研究局限

尽管通过质性资料较好地揭示了在线健康社区中的隐私悖论及青年用户认知决策的动态性,但研究仍存若干不足。其一是样本缺少代表性以致结论扩展受限。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具有较高学历,相较于一般青年,他们的健康、媒介和隐私素养可能更高,因此更易抵抗隐私悖论。其二是访谈对象自我报告的表露意愿不完全等于他们在参与社区互动过程时的实际选择,此外愿意参加此次访谈调研的青年用户可能比普通用户有着更强的表露偏好。其三是因果推断问题,访谈语料不能直接识别因果关系,受访者和研究者均默认隐私态度是健康社区实践的前因。未来研究应重视实验研究、纵向设计和大样本调查,通过混合研究进一步检验本研究所得发现。

信息时代,个人健康信息在安全与保密等方面面临许多挑战。在线健康社区代表了一种脱离实体的社会秩序,尽管这种虚拟秩序与实地物理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并行存在,但关于隐私的社会准则和社会规范、个人健康信息隐私权利以及个体对信息持有控制的边界能否在线上环境达到稳定的状态并建立可靠的秩序,仍有待持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Y. J. Park, J. E. Chung, D. H. Shin. The Structuration of Digital Ecosystem, Privacy, and Big Data Intellig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8, 62(10): 1319-1337.
- [2] M. J. de Boer, G. J. Versteegen, M. van Wijhe. Patients'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Pain-Related Medical Information. *Patient Education & Counseling*, 2007, 68(1): 86-97.
- [3] Z. Yan, T. Wang, Y. Chen, et al. Knowledge Sharing in Online Health Communities: A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6, 53(5): 643-653.
- [4] J. Zhao, S. Ha, R. Widdows. Building Trusting Relationships in Online Health Communiti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3, 16(9): 650-657.
- [5] N. Armstrong, J. Powell. Patient Perspectives on Health Advice Posted on Internet Discussion Boards: A Qualitative Study. *Health Expectations*, 2009, 12(3): 313-320.
- [6] A. Barak, M. Boniel-Nissim, J. Suler. Fostering Empowerment in Online Support Grou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8, 24(5): 1867-1883.
- [7] J. Powell, N. McCarthy, G. Eysenbach.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Users of Internet Depression Communities. *BMC Psychiatry* 3, 19(2003) <https://doi.org/10.1186/1471-244X-3-19>.
- [8] 王昕, 邓国基. 互联网中的日常“隐私”实践——基于青年群体的质性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12: 51-56+80.
- [9] 范哲. 基于用户画像的数字原住民社会化媒体采纳意愿的阶段性分析. *现代情报*, 2017, 6: 99-106.
- [10] 赵晶. 在线健康社区中成员价值共创行为.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68-73.
- [11] 黄晓斌, 张明鑫. 在线健康社区青少年群体用户健康信息需求研究.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20, 5: 37-47.
- [12] S. A. Rains, V. Young.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on Formal Computer-Mediated Support Groups: Examining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 Outcom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9, 35(3): 309-336.
- [13] N. Kordzadeh, J. Warren. Communicating 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in Virtual Health Communities: An Integration of Privacy Calculus Model and Affective Commitment.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17, 18(1): 45-81.
- [14] L. Bishop, B. Holmes, C. Kelley. National Consumer Health Privacy Survey 2005: Executive Summary. Forrester Research, (2005).
- [15] H. Li, A. Gupta, J. Zhang, R. Sarathy. Examining the Decision to Use Standalone Personal Health Record Systems as A

- Trust-Enabled Fair Social Contrac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4, 57(1):376-386.
- [16] C. Campos-Castillo, D. L. Anthony.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Implications for Patient Disclos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2014, 22(e1):e130-e140.
- [17] F. Belanger, R. E. Crossler.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A Review of Information Privacy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IS Quarterly*, 2011, 35(4):1017-1041.
- [18] H. Xu, H. -H. Teo, B. C. Y. Tan, et al. The Role of Push-Pull Technology in Privacy Calculus: The Case of Location-Based Servi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9, 26(3):135-174.
- [19] E. Hargittai, A. Marwick. "What Can I Really Do?" Explaining the Privacy Paradox with Online Apat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10(21):3737-3757
- [20] 邓汉慧, 张子刚. 西蒙的有限理性研究综述.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6:37-41.
- [21] F. D. Davis, R. P. Bagozzi, P. R. Warshaw.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Use Computers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22(14):1111-1132.
- [22] V. Venkatesh, C. Speier, M. G. Morris. User Acceptance Enablers in 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about Technology: Toward an Integrated Model. *Decision Sciences*, 2002, 33(2):297-316.
- [23] X. Zhang, S. Liu, X. Chen, et al. Health Information Privacy Concerns, Antecedent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tention in Online Health Communities.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8, 55(4):482-493.
- [24] J. L. Welbourne, A. L. Blanchard, M. B. Wadsworth. Motivations in Virtual Health Commun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and Stres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29(1):129-139.
- [25] J. S. House, K. R. Landis, D. Umberso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Science*, 1988, 241:540-545.
- [26] A. Antonovsky.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Resistance Resources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B. P. Dohrenwend, B. S. Dohrenwe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Their Nature and Effects*. New York: Wiley, 1974: 245-255.
- [27] D. Umberson. Family Status and Health Behavior, Social Control as a Dimens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7, 28(3):306-319.
- [28] J. Pool, S. Akhlaghpour, F. Fatehi, et al. Data Privacy Concerns and Use of Telehealth in the Aged Care Context: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22, 160:104707.
- [29] N. K. Malhotra, S. S. Kim, J. Agarwal. Internet Users' Information Privacy Concerns (IUIPC): The Construct, the Scale, and a Causal Model.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4, 15(4):336-355.
- [30] J. P. Peter, S. L. Tarpe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Consumer Decis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7, 2(1):29-37.
- [31] P. A. Norberg, D. R. Horne, D. A. Horne. The Privacy Paradox: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tentions Versus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07, 41(1):100-126.
- [32] P. A. Pavlou, D. Gefen. Building Effective Online Marketplaces with Institution-Based Trust.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4, 15(1):37-59.
- [33] Y. Li. Theories in Online Information Privacy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an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2, 54(1):471-481.
- [34] M. J. Culnan, P. K. Armstrong. Information Privacy Concerns,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Impersonal Trus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9, 10(1):104-115.
- [35] M. J. Culnan, R. J. Bies. Consumer Privacy: Balancing Economic and Justice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3, 59(2):323-342.
- [36] T. Dienlin, S. Trepte. Is the Privacy Paradox a Relic of the Pas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Privacy Attitudes and Privacy Behavi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5, 45(3):285-297.
- [37] J. S. Adam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3, 67(5):422-436.
- [38] R. S. Laufer, M. Wolfe. Privacy as a Concept and a Social Issue: A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al Theory. *Journal of*

- Social Issues, 1977, 33(3):22-42.
- [39] M. L. Finucane, A. Alhakami, P. Slovic, et al. The Affect Heuristic in Judgments of Risks and Benefi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00, 13(1):1-17.
- [40] A. Acquisti, J. Grossklags. Privacy and Rationality in 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IEEE Security & Privacy Magazine*, 2005, 3(1):26-33.
- [41] 张玥, 朱庆华. 国外信息隐私研究述评.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13:140-148.
- [42] J. A. Obar, A. Oeldorf-Hirsch. The Biggest Lie on the Internet: Ignoring the Privacy Policies and Terms of Service Policies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0, 23(1):128-147.
- [43] A. Acquisti, L. K. John, G. Loewenstein. The Impact of Relative Standards on the Propensity to Disclos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12, 49(2):160-174.
- [44] F. Morando, R. Iemma, E. Raiteri. Privacy Evaluation: What Empirical Research on Users' Valuation of Personal Data Tells Us. *Internet Policy Review*, 2014, 3(2):1-11
- [45] 罗伯特·V. 库兹奈特. 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 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 叶韦明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70-73.
- [46] J. A. Maxwell. Understanding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2, 62(3):279-300.
- [47] H. Nissenbaum. 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Privacy Online. *Daedalus*, 2011, 140(4):32-48.
- [48] L. Lamberg. Online Empathy for Mood Disorders: Patients Turn to Internet Support Groups. *Jama*, 2003, 289(23):3073-3077.
- [49] S. Han, J. Lerner, D. Keltner. Feelings and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The 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7, 17(3):158-168.
- [50] D. Zolowere, K. Manda, B. Panulo, et al. Experiences of Self-Disclosure among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Rural Southern Malawi. *Rural & Remote Health*, 2008, 8(4):1-9.
- [51] D. Gefen, T. Heart. On the Need to Include National Culture as a Central Issue in E-Commerce Trust Beliefs.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s*, 2006, 14(4):1-30.
- [52] G. R. Milne, B. Maria-Eugenia. Trust and Concern in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Marke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actices.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1999, 13(1):5-24.
- [53] L. Brandimarte, A. Acquisti, G. Loewenstein. Misplaced Confidences: Privacy and the Control Paradox.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2010, 4(3):340-347.
- [54] H. A. Simon.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5, 69(1):99-118.
- [55] 张大伟, 谢兴政. 隐私顾虑与隐私倦怠的二元互动: 数字原住民隐私保护意向实证研究.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7:101-110.
- [56] A. M. McDonald, L. F. Cranor. The Cost of Reading Privacy Policies.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8, 4(3):541-565.
- [57] B. Caplan. Rational Ignorance versus Rational Irrationality. *Kyklos*, 2001, 54(1):3-26.
- [58] S. Barth, M. D. de Jong. The Privacy Paradox- Investigating Discrepancies between Expressed Privacy Concerns and Actual Online Behavior-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17, 34:1038-1058.
- [59] T. O'Donoghue, M. Rabin. The Economics of Immediate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00, 13(2):233-250.
- [60] A. Rubinstei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The Case of Hyperbolic Discoun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3, 44(4):1207-1216.
- [61] F. W. Irwin. Stated Expectations as Functions of Probability and Desirability of Outcom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53, 21(3):329-335.
- [62] H. -T. Chen, W. Chen. Couldn't or Wouldn't? The Influence of Privacy Concerns and Self-Efficacy in Privacy Management on Privacy Protec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5, 18(1):13-19.
- [63] 杨异. 网络环境下的公民权利意识.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82-84.

- [64] A. Drolet, I. Simonson, M. F. Luce. When Does Choice Reveal Preference? Moderators of Heuristic versus Goal-Based Choic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9, 36(1): 137-147.

A Qualitative Study of Young User's Privacy Concerns and Interactive Practice

Geng Shup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ssue of health information privacy is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practitioners,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as the online health community and its digital market continue to grow rapidly. Although most young users express concern about privacy, they continue to disclose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private health information during interactions with community members. This inconsistency between stated preferences and actual behaviors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the “privacy paradox”. Drawing on several models of privacy calculus and cognitive biases, we investigated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 processes of this paradox by interviewing 14 young users of an online health community, aged 18 to 35. We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es’ self-reported health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ehaviors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ir perception of benefits rather than their evaluation of risks, thus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privacy calculus model, which portrays decision-makers as naturally economic-rational agents. More specifically, the presenc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overconfidence bias, immediate gratification, and other fundamental external and internal limitations prevents our interviewees from making balanced decisions. Instead, these factors nudge them towards bounded rationality or even biased decisions, with numerous benefit and risk based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and the threat of privacy abuse involved in this cognitive process. We contribute to the privacy paradox literature by contextualizing this phenomenon within the online health community, and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fforts in this field could benefit from our findings regarding the biased nature of privacy.

Key words: online health communities; young users; privacy calculus; cognitive bias; privacy paradox

■ 收稿日期: 2023-03-09

■ 作者单位: 耿书培,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流动站; 湖北武汉 430070

■ 责任编辑: 刘金波